

劝学篇·劝学篇书后

张之洞·何启 胡礼垣◇撰
冯天瑜 肖川◇评注

中国文化
近代转型
书系

冯天瑜：《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是近代中国人在论辩中对改革之路的探索，值得今人一读并掩卷沉思。

《劝学篇》清末发行量曾达两百万册，堪称当时最高印数的个人著作，而《劝学篇书后》则鲜为人知。今次合为一册出版，则显现二者思想激烈碰撞的灿烂火花。

劝学篇·劝学篇书后

王阳明著

中国近代
思想史论
卷一

劝学篇·劝学篇书后

中国文化
近代转型
书系

张之洞·何启 胡礼垣◇撰
冯天瑜 肖川◇评注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清]张之洞·何启,[清]胡礼垣撰.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10

ISBN 7-216-03470-8

I. ①劝…②劝…

II. ①张…②何…③胡…

III. 政治思想—中国—近代

IV. D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0125 号

劝学篇·劝学篇书后

[清]张之洞·何启 [清]胡礼垣 撰

冯天瑜 肖 川 评注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625

字数:291 千字

插页:1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2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18.60 元

书号:ISBN 7-216-03470-8/D·583



张之洞像



胡礼垣像



何 启 像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书系》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度，其灿烂的文明曾长期在世界领风骚、为前驱。近古以降由于农业一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自足与坚韧，专制君主集权政治的早熟与强固，与这种经济、政治相表里的宗法伦理型文化的完备与难以解构，当西欧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率先跨入近代门槛，并谋求建立世界统一市场之际，中国却在故道徘徊，其文化中蕴藏的近代性因子隐而不彰，并执迷于“天朝无所不有”的心态，紧闭国门，拒绝与近代西方交往。当时间推移到 19 世纪中叶，工业西方的殖民主义锋锐大规模指向东亚，中国开始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变局，与旷古未见的强敌交手，于创巨痛深之余，逐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启动社会及文化的近代转型。这一过程是艰难曲折、复杂错综的，它不仅要完成时间向度上的古今转换，还要处置空间向度上的东西交会，文明的时代性进步与民族性保持，往往发生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体用统一的格局被打破，呈现体用错位的混乱情状，这就导致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特别风貌，将其称之为“旧邦新命”，是简练而传神的。清初杨光先与西学派士人围绕应否采用西洋历法的辩论，已从一个侧面初现其情景，这是近代前夜中国知识界关于文化的时代性进步与民族性保持之间相互关系论战的一次预演。道光、咸丰以后，中国被渐次纳入世界近代化轨道之内，上述论题全方位、更尖锐地提上议事日

程。同治间大学士、理学家倭仁等守旧派与恭亲王奕訢等洋务派围绕应否“变法”、应否“师夷长技”展开的论争，光绪朝洋务派的“变器不变道”论与维新派的“道器俱变”论之间的辩难（典型表现是张之洞《劝学篇》与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的对垒），光宣之际保皇派与革命派的“革命”合理性之辨，都是中国社会近代转型间发生的文化论战，古今之争、中西之辨交会其间，呈现繁复错落的气象，其中不少论题不仅具有存史价值，而且其内涵决非明日黄花。本书系拟从展示这些去古未远的论战的基本史料入手，将我们研习、思考的一得之见穿插其间，供关注这一问题的朋友参考。

冯天瑜

2002年3月28日 撰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目录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书系总序	1
两种近代化方略的论战	
——《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评析	
..... 冯天瑜	1
劝学篇	张之洞 20
劝学篇序	23
劝学篇上（内篇）	34
同心第一	34
教忠第二	47
明纲第三	70
知类第四	75
宗经第五	81
正权第六	91
循序第七	98
守约第八	101
去毒第九	123
劝学篇下（外篇）	128
益智第一	128
游学第二	137

设学第三	143
学制第四	149
广译第五	152
阅报第六	156
变法第七	159
变科举第八	166
农工商学第九	177
兵学第十	185
矿学第十一	193
铁路第十二	196
会通第十三	199
非弭兵第十四	211
非攻教第十五	216

《劝学篇》书后	何启 胡礼垣	221
《同心》篇辩		223
《教忠》篇辩		231
《明纲》篇辩		241
《知类》篇辩		258
《宗经》篇辩		267
《循序》篇辩		276
《守约》篇辩		285
《去毒》篇辩		295
《益智》篇辩		303
《游学》篇辩		304

《设学》篇辩	305
《学制》篇辩	307
《广译》篇辩	308
《阅报》篇辩	309
《变法》篇辩	311
《变科举》篇辩	313
《农工商学》篇辩	314
《兵学》篇辩	315
《矿学》篇辩	316
《铁路》篇辩	317
《会通》篇辩	319
《非弭兵》篇辩	321
《非攻教》篇辩	324
 《正权》篇辩	 326

两种近代化方略的论战

——《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评析

冯天瑜

公元 1983—1984 年间，我在撰写《张之洞评传》时，通读张氏的《劝学篇》以及何启、胡礼垣的《〈劝学篇〉书后》，深为这两部著作所展现的古今中西文化冲突的错综性、丰富性所吸引，遂决心将二书并为一册，加以注评，奉献给读者。

一

近代中国处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公元 1901 年，敏感的梁启超指出：“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穷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1〕}面对这种旷古未有的“过渡时代”，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各种不同的政治和文化派别所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顽固抗拒“过渡”；有的致力于探究“过渡之道”，但关于“过渡之道”所设计的方

〔1〕 梁启超：《过渡时代》，载《清议报》第 82 期。

案又各不相同。就清朝统治阵营内部而言，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便分化出顽固派与洋务派两大集团。顽固派如同治间大学士倭仁、光绪间大学士徐桐，企图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去抵挡西方工业文明的袭来，他们声言，“道”和“器”均应一仍其旧，纲常教条不得有丝毫改易，从而坚持抗拒“过渡”的立场。洋务派则有限地赞成“过渡”，他们主张“变器不变道”，即在保存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留心西人秘巧”，提倡学习“西技”、“西艺”，也兼及“西政”，并在他们主持的部门和地区兴建近代化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修造铁路、创办学堂、组训新式陆海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当朝大臣有奕訢、桂良、文祥；疆吏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张之洞是后起者。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严重挑战——第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大举入侵；第二，不堪忍受外来侵略和专制压迫的人民揭竿而起。清廷权衡“御外夷”和“靖内寇”的轻重缓急之后，确立了“靖内寇为先”的方针。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洋务派便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质：一方面，他们所经营的“制器”、“练兵”、“兴学”等事业，显示了追求近代物质文明及部分近代制度文明的趋向，展现出对外部世界有限的开放态度，从而为中国脱离中世纪故迹，纳入近代化轨道奠定了某些基础；另一方面，他们的事业又未能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和中古文化体系的框架，并具有反人民性质，他们学习西方技艺，已由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变为“师夷长技以制民”。洋务派所追索的“过渡之道”并非要通向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而是在保存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实行某种程度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教育的近代化改造。洋务派的这一基本特征，在这个派别的后期巨擘张之洞 1898 年所著的《劝学篇》中得到充分展现。

十九世纪后半叶，与洋务派相伴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郑观应等人也开始

了自己推进“过渡之道”的活动。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工业技艺，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制度。十九世纪中后期登上舞台的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反映了新兴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给中古末世开明士人带来的觉醒。改良派力倡发展新的生产力，进而倡导学习与这种新生产力相共生的西方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科学以至政治理想，从而成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社会批判的锋芒，已不限于顽固派的冥顽不灵、深闭固拒，而且还指向洋务派的种种弊端。他们揭露洋务大吏不过是“以洋务为终南捷径”^{〔1〕}“学习西法二十余年来，徒袭其皮毛而已”^{〔2〕}一些改良主义者（如王韬、郑观应）开始鼓吹变法，成为十九世纪末叶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先声。

如果说，早期改良主义者中的某些人，例如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多为洋务大吏的幕僚，依附于洋务派，寄希望于洋务派，企图通过自己的劝谏和建策帮助洋务大吏完成“自强”事业，那么，稍后的何启、胡礼垣生活于西风较烈的香港，又目睹了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并感受到民营工商业在“官督”之下的艰难困顿，从而产生摆脱洋务大吏政治控制、经济束缚的要求。于是，他们明确地与洋务派分道扬镳，并且力图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发出了求“民权”的呼声——尽管这种呼声还相当微弱、怯懦。何启、胡礼垣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们公元1899年合撰的直接反驳张之洞《劝学篇》的《〈劝学篇〉书后》中。

总之，十九世纪即将结束的两年间先后刊行的《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成为洋务派与改良派思想交锋的记录。洋务

〔1〕 王韬：《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2〕 王韬：《文录外编》卷十，《火器说略后跋》。

派和改良派这两个对近代中国影响巨大的派别军政外交方略、经济政策、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一系列差异和分歧，在这两部著作中都壁垒分明地得以展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近代化方略。因此，《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这两大派别思想特征，进而研究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典型文献。

二

《劝学篇》的作者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进士。早年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曾是著名的清流党人。光绪七年（1881年）补授山西巡抚，开始由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光绪十年（1884年）署理两广总督，正式展开洋务建设，中法战争期间，竭力主战，并起用老将冯子材，奏请唐景崧率师入越，会同刘永福所辖黑旗军抗法，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光绪十五年（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此后在督鄂及暂署两江总督的近二十年间，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建芦汉铁路，兴建各类学堂，大量派遣游学生，组训江南自强军、湖北新军，造成一种耸动朝野视听的格局，张氏长期坐镇的武汉，继上海、天津之后，成为又一洋务基地和实力中心，张氏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1〕。

由于张之洞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主战派健将，赢得“天下之望”；而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更使他声名大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被舆论界推重为“朝廷柱石”。因此，公元1895年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曾对暂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寄予厚望。张之洞则企图利用强学会扩大自己的影响，遂捐银五千两，列名入会，以后张又成为上海强学会的发起人。公

〔1〕《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在鄂行政》。

元 1896 年张之洞返回湖广总督本任，曾札饬湖北全省官销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同年秋冬之际，《时务报》连续发表梁启超、徐勤等人批评朝廷丧权辱国和种种社会弊端的论文，张之洞认为是“越轨”文字，便指示汪康年对梁启超加以掣肘，迫使梁于 1897 年 11 月愤而离沪赴湘。这是洋务大吏与维新志士发生明显冲突之始。

公元 1898 年初，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这个运动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同时，作为宦场老手的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1〕}，他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实权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这样，既是为着捍卫纲常名教，也是“预为自保计”，张之洞于公元 1898 年 4 月撰写了《劝学篇》。张之洞后来这样追述写作《劝学篇》的原委：

“自乙未（1895 年——引者）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金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2〕}

可见，张之洞写《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3〕}。这便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其实，张之洞的这一思想酝酿已久，早在他作京官清流时，便常以“体用”这对范畴规范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彼此关系；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张氏出任山西巡抚时，更提出“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的论点。不过，1898 年问世的《劝学篇》将这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而作为那一时代的特

〔1〕《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

〔2〕《抱冰堂弟子记》。此记托名“弟子”，实为张之洞自述。

〔3〕《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定产物,《劝学篇》攻击的重点,是被他指为“邪说”的维新理论。诚如张氏的幕僚辜鸿铭所指出的,张在戊戌间新旧两派即将摊牌的关口作《劝学篇》,目的在“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1〕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所谓“通”,指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倡导的“新旧兼学”中的“新学”亦包括“西政”,这比早期“中体西用”论者的“西学”=“西艺”的观点进了一步,然而,张之洞所说的“西政”虽扩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项,却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2〕。可见,张氏唯恐西学中那些锋芒直逼君主专制制度本体的内容在中国得以传播。一言以蔽之,张之洞的公式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3〕

出于对无力“应世事”的顽固派那套僵化思想的不满,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多处批评“守旧者”的“不知通”,而“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4〕;他责备守旧者对新学的拒绝是“因噎而食废”〔5〕。并在《劝学篇》的外篇中力主“益智”、“游学”、“广立学堂”、“译西书”、“阅报”、“变法”、“变科举”,倡导发展“农工商学”、“兵学”、“矿学”,主张筑铁路以通血气,会通中西

〔1〕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2〕 《劝学篇·设学》。

〔3〕 《劝学篇·会通》。

〔4〕 《劝学篇序》。

〔5〕 《劝学篇序》。